

# 目 录

- 一、从入党到入獄……………張克明
- 二、抗日战争时期登云地区的“实践社”  
和“海燕剧团”的概况……………郑 板
- 三、我們对于龙川救亡工作之意見……………（摘自  
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龙川日报）
- 四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通报  
……………郑板复制
- 五、龙川一中概况
- 六、龙川县参加广州农讲所毕业学员黄超凡等七  
人的事迹簡介……………叶送青、黄义整理
- 七、中大服务团救伤班……………曾炎口述丘文添整理
- 八、龙川第一县令赵佗……………魏 平
- 九、佗 城……………叶送青
- 十、黄党羣同志事略……………叶送青
- 十一、李荣傳……………陈选材
- 十二、征文启事

# 从入党到入狱

-----1938至1942年在龙川县工作的回忆-----

张克明

張克明同志的回忆录“从入党到入狱”在龙川党史資料汇编第十期发表以来，甚受各方重视，认为資料翔实，立論平允，如实反映了当年的历史面貌，是一篇好史料。現經作者将原版校訂一次，全文轉載，以飭讀者——編者

## 一、在龙川入党

我是1933年进了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系以后，才开始思想转变的。在这以前，讀中大附属高中那三年时间里，虽然参加过一些抗日爱国的宣傳活动，但基本上

还是书呆子，在书本中，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学问，寻找真理。进了大学以后，经老师的开导，同学的启发，我才开始从象牙之塔里跑了出来。

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、邓初民、萧隽英等是中大有名的进步教授，专讲马列主义的，他们在讲课时，或慷慨激昂，语惊四座，或深入浅出，剖析入微，无不激动人心，发人深思。当时的同学朋友中，如曾振声（曾生）、方秉维（方少逸）、罗宗煌（罗哲明）、粟稔、黄焕秋、张直心……等一大批同学都是追求真理的积极分子。我就是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促进下，开始寻找革命道路的。

我和何思敬的师生感情很厚，我向他表示要找党的关系。这在白色恐怖时期，非至亲的知己人是不敢作这表示的。何思敬表示他的党关系也暂时断了，但总可以找到的。不久，何思敬介绍我与梅龔彬认识，梅龔彬刚在日本坐牢一年多之后回到香港，正在搞“中华民族革命同盟”，任同盟的宣传部长。我亦向他表达了我要找党组织的愿望。梅龔彬说，现在是搞抗

日民族統一戰綫，把这工作做好了，党会来找我們的。这样，經何思敬、梅龔彬两人的介紹，我就参加了李济深、陈銘樞、蔣光鼐、蔡廷锴等人領導的“中华民族革命同盟”。不久，他們又介紹我参加“救国会”。以后，我有同学已經参加党了，私下征詢我是否参加，我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何、梅两人身上，因此，沒有及时参加。1938年春中山大学服务团（原名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）北上劳軍，我和方少逸、黄杏文都是团员，准备到陝北劳軍时，到那里参党，因为何思敬已在延安，参党是沒有問題的。料想不到，到了西安，因为一个偶然的失誤，沒有去成。最后，广州淪陷，我与方少逸、黄杏文等觉得这样到处奔跑，不是办法，一定要找一个立足之地，这才决定我和黄杏文先回龙川。

但是，怎样找龙川地下党的关系呢？我們在韶关找到陈汝棠。陈汝棠是当年华南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，我們早就合作过的，他介紹我单独去南雄找古大存同志。我在一間客店里，会到古大存同志，我把中大服

务团的情况和我们团员的情况向他介绍了，又把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也给他看了。我说，我们在武汉大和街八路军一间办事处的楼上住宿那段时间，曾通过梅龔彬表示我们愿意参党的愿望，但因为当时工作地点不固定，不好联系，故未被接受，现在我们要回龙川去工作，希望找到党的组织关系。古大存同志仔细听了我的话以后，十分高兴，他十分同意我们回龙川工作的一些想法。他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，叫我去五华县某地找张某人。——地点、人名我现在忘却了。

这样，我找党找了三、四年，现在才找到一点头绪。

1938年秋，我和黄杏文两人，从韶关经过江西的三南、和平到达龙川老隆，我们是从抗日前线的西安、洛阳、徐州、台儿庄、长沙、南昌等地回来的，我们戴的中大服务团徽章，中间一个大红五角星，非常醒目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很引起人们的兴趣，说是从前线回来的。李健行、张凤楼已在龙川开展了党的工作了，向我们表示欢迎，并希望大家一起搞抗日救

国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黄慈宽同志单独来谈，表示希望我们领导龙川青年来干抗日救国工作。他已是党内的负责人之一，但作为青年学生身份和我谈话，非常诚恳热情，我很受感动。

在老隆这几天里，我热情地参加了龙川青年保卫家乡座谈会，又与各方面的人士接触。之后，我向李健行表示要回田心屯老家一行，并打算到五华县某地走一走。李健行大概猜懂了我的意愿，说不一定要去五华，跟蒲特谈谈也可以，又说蒲特刚去了五华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
说来也巧，我在回田心屯的路上，刚到牛屎坳，碰到蒲特从五华回老隆。饶彰凤当时叫蒲特，他原籍大埔。他的母亲却是龙川人，名叫张凤。蒲特后改名，意思是张凤生的儿子，所以叫张凤生。后来，又把生字去掉，加上饶姓，就成了饶彰凤。当时，他经常到老隆瑞昌展出入，瑞昌展是大埔人开的铺子。

旧友重逢，彼此高兴。牛屎坳离我家只二、三里路，我请饶彰凤到我家坐坐。华城小学那天刚好杀

狗，听說我回来；便邀我两人一起去吃飯，喝了几杯。飯后，我和饒彰凤到我家里的閣楼上深談。

我們早就認識的，也同样搞过华南救国会的工作。我猜想他已是黨員，說話并不拘束。我說我有古大存的介紹信，要去五华找某人，解决党的組織問題。他說不必去了，將介紹信交給他就行了。他說关于參党問題，可直接与李健行（当时叫罗健行）联系，由他解决。他說他先会向李健行打招呼的。我非常高兴，想不到走遍五湖四海沒有找到党，而今竟在我家乡田心屯下山家里的閣楼上找到了。真是俗語說的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說实在的，在旧社会找党，說易亦易，說难也真难。

过几天出老隆，在冠华酒店与李健行談話，談到深夜，談了抗日形勢，国共合作，統一战綫，老川的形勢，党的任务等等。因为我与李健行也是多年認識的，談得很融洽。最后談到我的入党問題，我把申請書交給他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健行又和我談話。最后他問我有

什么要求，我說我初到龙川，我想知道誰是黨員，这样，工作起来比較方便。李健行严肃表示，这是不能允許的，現在还是单綫联系，不过工作久了，你会知道誰是我們的同志的。这时，他把我的申請书当我面燒了，說这是不能保留的，接着，我們两人便散步到行人稀少的平民医院后山，那里有防空壕，我們看四面无人，便跳入防空壕里举行入党仪式。

防空壕里虽然只有两人，气氛却很严肃，我們都笔直地站着。李健行首先发言，說今天代表党組織接受張克明同志入党，又說如果在延安接受新黨員，是开大会庆祝的，今天我們在地下，不可能这样做，但我們热烈欢迎的心情是一样的。接着，我簡單地說了几句話，表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心中无限兴奋，愿意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貢獻一切。接着，李健行把写好的入党誓詞交給我，我举行宣誓，念完誓詞，李健行又当面把誓詞燒了。仪式完毕，我和李健行热烈握手。这十多分鐘的入党仪式，我印象十分深刻，从此，我好象增添了无限力量，在我面前好象展开着一

条光明的大道。

李健行只是作为我入党仪式的监誓人，饒彰凤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由于我在龙川当地的特殊关系和身份，根据尹林平、饒彰凤同志的指示，为了政治和工作的需要，我的组织关系与李健行联系。那时，日寇在广东沿海各县大肆进扰，地下党必须大力发展党员，组织力量。我入党之后，预备期很短，不久便被选为县委兼统战部长了。

为了工作需要，李健行叫我做张威远、黄用舒两人的工作，希望他们参党。

张威远是长途汽车司机，专走韶关、老隆、兴宁、梅县这一线的。这对于党的交通很有帮助。他是我的叔祖，一向对我很好，我原想他的参党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可是经过谈话之后，他表示对我走的革命道路十分赞成，而且尽力帮助，但要他参加党，他认为还没有必要，他不愿参加什么组织。这次我的工作虽没有成功，但是还等待着他。张威远一直还好，各方面协助我们。

黃用舒看到李健行、張鳳樓和我們一班青年很活潑，主動向我表示要參黨了。我和黃用舒是老朋友，早在1835年我們就談過如何尋找黨的組織關係的事，現在就好解決了，我和黃用舒談過幾次話之後，把情況告訴李健行，他要我為黃用舒舉行入黨儀式，照我的入黨的模式進行。我和黃用舒兩人散步到平民醫院後山，看見四面無人，便跳入防空壕，舉行入黨儀式。那天，他很激動，說找黨多年了，現在才實現了願望。

黃用舒此人很奇特，他是老隆水背人，他很能利用黃姓家族的一些關係作掩護。他是在中山大學農學院畢業，對蠶桑很有研究。他在老隆當過區長、電話局長、校長等，社會上很有地位。他不抽煙，不賭博，自奉極薄，頗得眾望。他追求馬列主義，願意結交新青年，對1928年發生過農民起義的四甲和田心屯的青年學生有特殊的偏愛，認為都是進步的。抗日初期，當麥任同志來龍川開始建黨時，他就做了不少的掩護工作。黃用舒的參黨，對黨的助幫起了很大的作

用。在旧社会，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和这样的家庭环境出身的人物，能这样热情追求馬列主义真理，确是难能可贵。

稍后，参党的仪式就不是一对一了。黄杏文与曾瑞祥入党是在青年书店楼上，由我与魏南金参加，作为介绍人和监誓人，这样是四人一起参加仪式的了。方少逸参党的仪式则是由我介绍，魏南金监誓，三人一起参加的，地点就在老隆平民医院。

方少逸的入党问题更好说了。1938年春，我们在武汉时，就商定由他先找党的关系，先入党。他在武汉时，曾写过入党申请书，我还为他参加过一些意见。可是因为我们行止未定，组织关系卒之未能解决。以后，我和黄杏文先回龙川找党的关系，他是知道的，所以，方少逸一到龙川，很快就入了党。

当时，我们有意識地接近黄崇礼和张鹤文，但他们没有参党愿望。我们曾培养张伯良（张炳卿的长子）做积极分子。张国馨当时做龙川县教育科长，在龙川知识界有点影响，他看到我们很活跃，半正经半

开玩笑地对我說，他想参加共产党，問有門路沒有。但他的态度不坚决，以后他去了韶关，又参加了重庆中訓团，参党的問題当然用不着談了。

現在，回忆一下，这一段时期吸收入党的新黨員，都是很好的黨員，在成份上与1927——1928年暴动年代的黨員大不一样。現在吸收的，大多数是知識分子大学生、中学生、教师，而且品学兼优，在社会上很有信譽的。有許多做父母的，还希望和鼓勵他們的子女跟我們做朋友，跟我們“同陣”。的确，我們这些人在当年不过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不怕艰險，艰苦学习，热情純洁，胸怀大志，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，不惜牺牲宝貴的生命，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真令人敬佩，令人怀念！經過几十年的考驗，这一批黨員确是成长得很好，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，都取得了成績。

我参党之后，因为我有比較好的条件，我就专与上层政治人物打交道，我就不做发展黨員的工作了。除了党內的领导层的同志外，别的黨員也不知道我的

政治面貌。今天看来，这样做法是十分正确的。

## 二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利形势

1938年十月十二日，日寇在大亚湾登陆，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，仅十多天时间，广州附近各县和东江下游大片国土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。特别是广州淪陷后，惠州、博罗地区形势危急。当时敌机轰炸龙川大江桥，不断扫射无辜平民，骚扰后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，人人都有国亡无日之感。这时，旅居在广州的大批同乡，包括工人、商人、教师、学生、士兵、公务人员都回到龙川来了。他们以亲身的感受，宣传日寇的强暴。这些都是对我们党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有利的客观条件。同时，地下党正确地理解和执行统战政策，也是有利于开展工作的主观条件。

当时，全县民众，不论那一个阶级，那一个阶层，都怕做亡国奴，都同仇敌愾，都是应该动员和组织起来的，但是从统战角度来看，有几个方面却是要特别进行工作的，即国民党的县政府，国民党的县党

部，龙川县民众抗敌后援会，龙川自卫队干训班，各中、小学的教师和学生，尤其是高中的学生，及一般的上层政治活动人物和开明士绅。此外，还有外地驻龙川机关及当地的驻军等。在抗战初期到1940年前半年，龙川地下党与他们的关系都是相处得很好的，互相鼓舞，彼此谅解。他们对抗日救国工作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。

在县政府方面，首先是与县长邓鸿芹的关系搞好。由于我与邓鸿芹有师生之情，而且他一向对我很有好感，所以工作起来，较为方便。这里，先谈一点背景材料。

1928年，龙川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失败以后，邓鸿芹也被捕了，幸好黄麟书在广州把他救出来。邓鸿芹当时与党是怎么样的关系，我不清楚。但据我所知，他出狱以后，他的政治倾向还是好的，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好的。

1937年秋，我从中大毕业后，回家看祖母，在家里住了十多天，就接到方少逸、冯伯恒的信，邀我到

香港去組織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。我路過龍川城，見了鄧鴻芹，那時他正在龍川一中做校長。我對他說明去香港的目的，他听了大为反对，對我說了一番話。其實他這番話，是他的政治形勢分析的真实思想。

他說，現在抗日戰爭打起來了，國民黨政治腐敗，軍隊沒有戰鬥力，始終要失敗的，共產黨在西北，打游擊戰，始終要壯大的，但離我們大遠。日寇是要入侵廣東的，到那時，國民黨垮了，管不了我們了。我們只能現在就把民眾組織起來，自己有槍在手，自己打天下，才是真正的自救之路。要有武裝，自己有了本錢，共產黨會來找我們。我們要延安的共產黨，土共產黨不靈。老實說，龍川還沒有幾個夠做共產黨的資格的。他說，現在你應該在本縣立足把宣傳民眾，組織民眾的工作做起來，你跑去香港跟那些太太們搞那些名堂，毫無用處。

他一定要我在龍川留下來，要我先與楊榮春在老隆搞《龍川半月刊》。這樣，我被說服了，便留下來與楊榮春合作。我有時替鄧鴻芹寫一點社論性的文章，

他差不多不作什么修改原文照登的。

这样，在龙川住了个把月，与楊榮春合作得很好，可是冬天到了，方少逸、馮伯恒又不断来信催我快去香港，于是，我又决心离开龙川去香港。我向邓鴻芹辞行时，他频频摇头，不同意我走。

相隔一年，我又从抗日前綫回到龙川了。邓鴻芹很高兴，他很得意的說，我早就說你搞服务团不是办法，現在还不是回来了。这时，他即将上台做龙川县长了，他又重复他那套政局見解來說服我。这样，我和他在抗日的問題上見解相同，如办《龙川日报》、組織“龙川青年抗日先鋒队”、举办“龙川青年自我教育班”、創辦“青年书店”，他都表示同意，并愿意支持。我們与县长的关系好了，他的下屬和下屬机关就容易打交道了。

可是到了1939年下半年以后，邓鴻芹觉得政治局勢并不如他估計的那樣，国民党还不是馬上要垮台，他的县长还能夠做下去，他的政治态度就表現得越来越坏，甚至出現了像“陶女事件”这样的問題。

龙川县党部的书记长，一般是听命于县长的。当时的书记长黄础增，与我有点亲戚关系，彼此之间感情还可以。我每次到老川县城，多是到县党部吃饭、住宿。那时，正在宣传国共合作，一致抗日，我们和国民党县党部还没有什么矛盾。

我常常与书记长黄础增谈到深夜。一般地说，对于抗日问题，对于发动民众，将来在老川打游击问题，彼此意见都很一致，但有时，黄础增也说一点怪话，如他说“最后胜利，必属于我”，会不会“最后胜利，必属于‘俄’，共产党得到最后胜利”。又说“拥护蒋委员长”就可以了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”，是不是要抗战到底才拥护呢？他谈论这些问题时，则常说贵党意见如何？在我们两人谈话，别无外人的时候，他总是向我开玩笑，贵党，贵党的，其实，他并没有肯定我是共产党员，只是故意开玩笑而已。

黄础增走了，换上黄继枚当书记长。那时，正是政治逆流开始，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很坏了。最初，我